**《新青年》——洪水前的暴雨**

李丰克

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将中国人民解救出来，反而是从一个深渊走入另一个深渊。风雨如晦，民生凋敝，一群先进知识分子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得出先开民智的教训，号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在1915年的9月，从清末良莠不齐的报刊大潮中，《青年杂志》悄然建立，随后改名《新青年》，异军突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给陈腐的封建思想一点小小的新思想震撼。

一，《新青年》创刊始末

清末的报刊大潮，虽然称不上是百花齐放，但是仍存在大量质量优质的报刊，其中有一种称作同人杂志，即若干志趣相投的人共同创办的杂志，其大多目光远大、胸襟开阔，但是大部分都因为圈子太小以至出现什么变故就人亡政息了。在各种成熟的编辑技巧和同人杂志的团结精神的影响下，《新青年》就这样横空出世，陈独秀等人创立的事业，不是基于一张白纸，而是在已经纵横交错的草图上删繁就简、添光加彩。关键在于他们如何使用这传播文明之利器，去给旧社会的死水，激起新的浪潮。

创立伊始，《新青年》以共同的文化理想吸引作者，更是在第四卷时，直接取消了稿酬，宣告不另购稿，内容均由同人自撰，体现了他们谋义不谋利的情怀。这种情怀，自然也吸引了诸多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作者，如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等。共同的文化理想以及北京大学作为依托，使得这个同人杂志相较于同时期杂志更加稳固。从1915年创刊，到1922年宣告结束，共计七年，共出版九卷。

新青年的发展，并不是一开始设计好的，而是在运作中逐步成型。一开始他们以开化民智，破除礼教为共同理想，后来逐步发现涉及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太多，无法一概而论，其内部也不免出现分歧，尤其是在1919年，其内部更是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胡适为首的“只谈思想文化变革，莫谈政治”，另一派是以陈独秀、鲁迅等为首的投身社会革命。两派没有什么对错，只是想法上的冲突。纵观九卷，其基本立场属于“有明显政治情怀的思想文化建设”，既体现在民主科学的口号上，也体现在新文化与文学革命的实践上。与其说是分裂，不如说是兵分两路，从两个角度去实现最初的共同理想。

二，《新青年》的历史意义

后人谈新青年，认为他的意义先是思想史，而后才是文学史、政治史。换句话说，就是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从事文学革命和政治参与。

《新青年》以思想文化革新为主旨，起初，他们翻译一些外国的文学，后来自己也写一些文章，后来他们发现，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应该同时进行，才可有成效。为此他们找到了第一个突破口——白话文。

“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这句话成为了引爆文学革命的导火索。而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八项改良：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陈词滥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随后白话小说、白话散文、白话诗并驾齐驱，最后191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成立，宣告了这场文学革命的大成功。以白话文为起点，在旧礼教上砸开了一个缺口，从此会有更多的新思想从这个缺口中顺理成章的流入，从文学上到思想上。如果一开始就将其定位为思想运动，其效果肯定是逊色于以这么一场精彩的文学革命为切入点的思想革命的。

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用发起运动的方式促进文学革新。为了达到此目的， 他们还创造性的改变了思想传播的文学表达方式。

“精明且成功的报人，其心中的理想文章，应该是有‘大体’而无‘定体’的”。文章随时而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文学，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重点在于传播，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已经是走了一大步，但是思想在文学上的传播仍困囿于“述学”“论文”等等的文章里，“文以载道”仍然处于主流地位，显然对于广大群众的传播，是有门槛的，对此，他们决定尝试，尝试革新其他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表达来载道。当时，关于革新的讨论最多的，一是诗，二是戏曲，再往后是小说和散文。

特别的，他们开辟了新板块——通信，相当于现在的“留言板”，一开始只是读者提问，编辑答疑，后来逐渐读者的主体性开始萌现，通信成了读者自由发表意见的一块天地，欢迎提出不同的意见。作为同人杂志，特意引入异己因素，并且提供敌我双方厮杀的阵地，···不仅增强了读者的参与度，而且利于思想的碰撞与传播，不再是筑高台唱独角戏的传播方式，而是与受众人群面对面，与敌人面对面。这可以称得上是最别出心裁的创意了。因此通信在同人的心目中，成为了一种“思想草稿”。

此外，同样还有“随感录”，虽然不是他们的原创，但是也有显著的效果。随感的问题特征是短小精悍、灵活多变，适合谈论瞬息万变的时事。随感录的开创，相当于为作家开辟了应该自由挥洒的专栏，不仅增加了可读性，也凸显了政治表述的文学化的追求。这其中，鲁迅尤为突出，虽然27则的篇数远小于陈独秀的58则，但是其文风尖锐，酣畅淋漓，有一种寸铁杀人的感觉，为思想的开化做出卓越贡献。

以文学改革为基础，《新青年》也提倡过若干思想变革，如戏曲变革、妇女问题、劳工问题、反对孔教等等，虽然到现在有的仍有较大争议，但是其对旧思想的冲击是功不可没的。至于其政治史的意义，早已融合在思想和文学改革之中，并且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后续的社会革命中最为突出。

我们谈《新青年》的作品，更应该关注的应该是其“文学史意义”而非“文学价值”，“思想史意义”而非“思想价值”，这里只作主次关系，不是不谈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事实上，《新青年》里面有些篇目的文学价值实际上是不高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以此单方面看，结合当时的情况，处于文学改良初期，其价值更多的在于开创和尝试。当历史责任感与个人审美冲突时，改革者不免会陷入两难境地，自觉扛住黑暗的闸门，放后人去光明的地方去的先行者，以牺牲文学成就来换取革新，这是伟大的。好比是那飞天的万户，你大可以说他的愚笨和异想天开，但是当人们真正踏入太空时，我们怎能忘记这位先行者的事迹。《新青年》做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是一定是对的。

三，《新青年》的偏激性

《新青年》改革的思想，有些直到现在仍饱受争议，如反对孔教等等。但是其中争议最严重的两件事，当属——反对戏曲和“双簧戏”

早在1904年，陈独秀就早已写文章提倡改革戏曲，倡导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唱淫戏等等。到后来反对孔教的浪潮之时，他们对中国传统与西洋新事物的观点，却是极端的反对传统、鼓励新事物。于是中国戏曲在这场思想变革中，无端被判了死刑。他们称中国戏曲“脸谱化的表演”、“助长淫杀心理与稠人广众之中”、“充满虚拟性、怪力乱神”，而西洋戏剧则是“注重写实”。傅斯年更是直接宣称“中国旧戏，毫无美学价值，难以当得起文学二字”。让事件更戏剧化的是，他又当众宣称，自己对中国的戏剧、音乐等一窍不通。并说“门内人已经陷深了，不能容纳改良，只能是我这种门外汉，不曾陷溺，才有资格谈论中国戏曲的未来”。这一番话，放到现在无疑会被群起而攻之，当时也差不多，只是当时处于反孔教的关键时期，这一番话非常鲜明地表明了自己要改良创新、与旧礼教死磕到底的立场，可是又对传统了解不够，显得像无理取闹。这件事也体现出了《新青年》的偏激性和局限性。

其他流派批判《新青年》时，提到了《新青年》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其中遭人批判的应该就是垄断舆论一事。批评者说他们“好骂人”“哗众取宠”“只图一时之快”，胡先骕先生也教育胡适等人“立言求其新奇，取其偏激…非新文化前途之福也“。白话文运动伊始，更是上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集合众多反对言论，撰成一挑衅之文，再由刘半农一一批驳，虽确实对反对言论直接进行了反驳，但是其语调刻薄，也引起了诸多不满，况且此举本身有违于学术讨论的道德要求，此处也可见其激进。

那么什么导致其激进呢？首先由于青年意气风发，对国家危亡处境感受敏锐，以至于烈火焚烧，急不择言，急于破处旧说。由此可见，言辞偏激不是缺点，而是“性情直率”的表现。其次，偏激是改革策略，不得不选用的道路，当时陈腐的旧思想已经根深蒂固，陈独秀等人看僵尸般的民众时，深知和风细雨的改革不能奏效，就需要这种激荡的、激烈的手段，思想冲突，甚至有些哗众取宠的感觉才行，这样才能在民众的一潭死水中，激起浪花，才可能叫醒民众。只有“鲜血”才能“洗净旧污”。这是一种牺牲个人品质与文学成就来换取革命运动进步的行为。

无论《新青年》是伟大还是偏激，是开创历史还是垄断舆论。他无疑对中国思想潮流的更新换代有重大意义。这群怀着抱负的青年，在晦暗的旧社会，如同一场暴雨，击打在旧社会的铁窗上，这是洪水来临前的暴雨，是最后通牒，一声声呼喊着旧礼教的死亡。洪水是《新青年》后的一切，是新社会的建立。不破不立，洪水是伟大的，因为他终于是结束了这些旧时代的废墟；洪水也是偏激的，他急于清理掉这一切，于是不由分说地卷走了一切，无论好坏。洪水涤净了人们身上背负许多年的历史的尘垢，人们在洪水中恼怒，反思，然后接受洪水的一切，建立新的世界。